

聚焦文学新力量

须一瓜,女,原名徐莘,生于上世纪60年代,现居厦门。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淡绿色的月亮》《蛇宫》《你是我公元前的熟人》《捉拉米苏》,长篇小说《太阳黑子》《保姆大人》。曾获2003年华语传媒最具潜力新人奖、人民文学、小说选刊、上海文学优秀作品奖及《小说月报》百花奖。

“废人”的世界

□陈 思

了自己农村长期贫困造成的生活习惯和城市生活的格格不入。

城乡差距化身为自卑和自尊、要强和脆弱,农村孩子与城市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种种矛盾,极度对立的冲突成为水清的死因。钱红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始终都希望水清继续走上学术研究之路,而水清面对扮演这样的角色和对方不断提高的期望标准,逐渐感到心力交瘁。她始终不上线的GRE成绩、面试时的糟糕表现和社交生活的无能,正是一面残酷的镜子,照出了他的原形——虽然他过上了体面的城市生活,但骨子里仍然是那个挤不进城市的“废人”。这一切矛盾的惨烈解决,源于水清在回家车上看到长相酷似自己的司机。司机的无礼粗俗使水清看见了一丝恐惧厌憎的那部分自己。在掘根心态的控制下,他最终拿起进口刀具将之捅死。

“逆袭”后的“凤凰男”无法逃脱对都市现代性的渴望以及无法地位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进一步转化为对乡下老根的自卑、鄙薄和克制不住的厌憎与恐惧。最终,这一切都必须以文明、高级、优雅的进口“双立人”牌刀具来得到解决。通过以城市文明象征的双立人刀具杀死“不合格的自己”,“废人”解除了自己的焦虑。

“多情”的内在能量

“废人”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多情”。这些小人物的内心世界令人丰富,并因此构成了内在与世界之间的极端矛盾——他们是“想太多”。“底层”一旦具有了这些“非分之想”,就是不稳定的、是危险的:一方面,他们很难按照现代性的种种规范做出合乎标准的动作;第二,个人意识的觉醒使他们不会满足于被压榨、被欺凌的现状;第三,由于缺乏理解世界、改造世界的真正能力,这种无法平息的内心骚动使他们处于无尽的痛苦之中。

对弱者泛滥的爱,是“非分之想”的其中一种。对花鸟之类美好精致事物的宠爱,往往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情趣,但在须一瓜小说里带有反抗的意味。对弱小的动物与植物情有独钟,使他们无法具备无情刻板的工具理性,从而表达了对彼端世界的拒绝。无疑,在须一瓜眼中,以利益计算为核心的工具理性是都市现代性的重要表现。管小健(《义薄云天》)和“豌豆颠”(《豌豆颠》)的爱猫、巡线工宗杉的爱鸟(《黑领惊鸟》)、小庆的爱花(《国王的血》),使他们无法以利益计算的方式去思考,大脑总处在开小差的状态。“爱”总在需要他们循规蹈矩的时候泛滥出来,使他们的行为出现偏差。

《穿越欲望的洒水车》也以“爱”作为主题,尽管其描绘对象不是“对弱者的爱”,而是“弱者的情爱”。如阿兰·巴丢所提示,存在论上的“爱”具有破坏性和解放性,从来都是挑战常规的。小说以夜班洒水车女司机和欢拨打寻人公司电话开始,打开了这位单身女性在丈夫失踪后的4年生活。因为对丈夫的刻骨眷恋而陷入失眠、焦虑,和欢主动调整到夜班。然而,思念、绝望与怀疑在夜幕下恣意生长。寂寞难耐之际,她也会勾引路上的陌生男人,以解决身体和心理的空虚。她一方面学会了打呼哨、疯疯癫癫、流里流气,另一方面仍然以丈夫的衣服、内裤、胡须留下的气味作为生存的力量。小说就在信念与放荡、清醒与疯狂之间狭窄的轨道上摇摇晃晃地行走。

破碎的追忆,拼接出了和欢的人生轨迹,小夫妻的拮据生活、她的文化与出身以及性格上的内敛封闭使他们的感情一开始就笼罩着阴影。文是职业中专学校的老师,和欢只是小县城食品加工厂的后勤司机,丈夫托园林局负责人吴志豪给和欢在特区环卫处找到开洒水车的活。婆婆看不起

和欢的出身,婆媳关系越发紧张,和欢只是隐忍退避。某日上午,丈夫在赶回家处理电子邮件时与和欢就鸡毛蒜皮小事发生口角,就此离家失踪。丈夫祝安失踪两月后,和欢违背婆婆的意愿选择流产,婆婆忧怒之下病倒去世,从此,和欢回到离群索居的单身生活中。丈夫的离开是步过,不是测还是无法忍受自己?

和欢宁可在对丈夫的思念中一步步陷入泥潭,而没有选择将就凑合地“过日子”。无论是粗俗的同事主母还是丈夫的同学志豪,和欢都选择拒绝。最终,和欢在丈夫失踪4年之后得到消息。原来丈夫在小县城外因车祸死去,作为无主尸体,没留下尸体和骨灰;小县城警察办案不力,也没有从随身财物中找到联系信息,是医院护士整理遗物时发现的联系电话,以至于拖了4年。由于制度上的漏洞与执法者的懈怠,这条死讯拖了4年之后才传到和欢这里。如果这个死讯不是拖了4年,以至于让和欢完全在岁月的磨盘上耗尽了希望与精气神,她还会不会在《简单爱》的歌声中开着洒水车冲下了大桥?和欢对交通队和执法者的批评只是虚晃一枪,城市底层和大众泛滥溢的“不正常的爱”才是主角。“爱”并不“简单”——周杰流的流行歌曲显得略轻浮了些。“爱”在这里,应该作为对都市现代性规定的“日常生活”的一次起义来理解。

“多情”常常是这些小人物悲剧命运的原因。如果不是“想太多”,他们会不会免去许多困扰、少了许多痛苦?可是,要求人们不要“想太多”而满足于非本真的存在状态,不正是城市现代性所携带的暴力之一吗?尽管作家没有从个人精神史的深度去阐发这种“想太多”的主体根源和思想根源,但“想太多”本身已是对城市规划权力打开的主体性缺口。

“废人”之用:由“废人”引向的现代性反思

可贵的是,须一瓜没有简单给“废人”赋予道德霸权。“废人”固然是城市现代性暴力的受害者,并不等于从道德视域看具有正当性。在《海瓜子,薄壳的海瓜子》《穿越欲望的洒水车》《火车火车娶老婆了没有》《毛毛雨飘在没有记忆的地方》《二百四十个月的一生》等作品中,“废人”的道德状况一再突破底线,普遍低于“常人”的平均线。这并非因为作家喜欢哗众取宠。对“废人”进行简单的道德夸奖或道德批判,甚至由此引申出对作家的判断,都将陷入一个更大的、更隐晦的陷阱而不自知。如实地描述“废人”,必然要触及到“废人”自身的道德困境。须一瓜的目的在于,探讨以“寻常”手段挣脱这种道德困境之不可能,最终使人反思这一状况的制度不合理。

制度性反思是一个方面,更深的的一个层次是对道德本身的探讨。正如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说的:“‘好’的判断不是来源于那些得益于‘善行’的人。其实是起源于那些‘好人’自己,也就是说那些高贵的、有力的、上层的、高尚的人们判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好的。意即他们感觉并且确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上等的,用以对立于是有低下的、卑贱的、平庸的和粗俗的。”但尼采也同时提醒我们,不应该将“奴隶的道德”视为道德本身,那么又该如何看待作为无强力者的“废人”所预示的道德前景?伦理问题的深入探讨这里无从展开。但现在可以知道的是,通过讨论“废人”的“不道德”,在避免将之“道德化”的时刻,我们的思考就被牵引着,走向了使道德成为可能的更广泛的思想结构。从这个角度来说,“废人”的道德问题就成为现代性反思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废人”派上了用场。

■创作谈

很多年前,陪孩子读过一个故事,故事细节和主角都有点模糊了,大概说的是勤劳的蚂蚁们,日日忙于工作,努力囤积冬粮、冬暖物质。邻居螳螂呢,成天游手好闲、游山逛水、游东荡西。很多蚂蚁都替它的冬天着急。冬天终于来了,大雪封山,黑夜漫长。蚁穴中丰衣足食的蚂蚁们渐渐精神倦怠,这个时候,螳螂来了。螳螂带着他在春秋夏积累的的全部见闻,带着它满肚子的事,开始为饱食终日、无聊之极的蚂蚁们讲述。蚂蚁原以为自己是螳螂的施主,没想到,最终,螳螂成为了蚂蚁的救星。

我想,有一只螳螂肯定是小说家。那只螳螂,会给蚂蚁讲述什么故事呢?

它可能讲述它见过的远方一个纵队的军队,如何浩浩荡荡吃掉了一头黄牛;可能讲述一只雌蚁如何挖空心思地奋斗,成为蚁后;可能是一只交配后反常不死的雌蚁,如何带着婚飞的翅膀,孤独而没有尊严地度过一生;也可能是一个传说:一亿年前,恐龙灭绝时,蚂蚁祖先是如何存活下来的;螳螂也可能讲述一只平庸的工蚁,因为计步器失灵,来到蝴蝶的王国,和一只小灰蝶成为朋友。它守护这小灰蝶从幼虫到成蛹,当它发现自己完全爱上小灰蝶的时候,这只小灰蝶却破蛹成蝶,翩翩上天。漫天的小灰蝶,蚂蚁认不出自己的爱人,而天上的小灰蝶再也看不清地面的小蚂蚁;还有蚂蚁替奴、奴隶违反的故事;放牧蚁对蚜虫的复杂情感;还有三只蚁后是如何勾心斗角、倾轧诡谋,最终蚁穴崩溃的;还可能讲述一只孤独胆小的兵蚁,临阵脱逃,又如何向蜜蜂学习,成为一代名臣,最后思乡心切,返回家乡,接受死亡宣判等等。

螳螂被蚂蚁需要,身怀不同故事的螳螂,可能被不同的蚂蚁需要着。总之,漫长夜,蚂蚁们明白,仅有粮食、泉水和温暖被窝是不够的,螳螂的黑夜讲述,让它们找到丰富的自我,让世界和它们连接,让它们看到蚁穴外面的风土人情,也看到他人内在的纠结万象。螳螂的讲述,让蚂蚁们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内心沃野千里,春暖花开或沟壑纵横,它们看到了五光十色、万花筒一样的情感天地,那是一个熟悉而陌生的崭新世界。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心思可以诉说,谁是被选择的螳螂呢?你又是一只关注哪一类事物人心的螳螂呢?有些螳螂是弦乐手,它精准地弹拨你的精神弦丝的高音区;有的螳螂喜欢在人的内心放火烧山,告诉你千姿百态不一样的个人真理;有些螳螂是灵魂的讨债鬼,它勒索人生的各种破绽、尴尬、别扭,雕刻人们的脆弱与摇晃,显影你以为别人不知的叹息之后的曲折与幽微;有些螳螂是情绪猎手,捕捉你沉默的聚集与黑暗的潜流;有些螳螂是预言家,是魔术师,是催眠师;有些螳螂擅长穴位按摩、提供慰藉;也有螳螂,像印度飞饼师一样,只负责抡甩希望与梦想的大饼,脆脆的、芳香的。

我想,那个寓言告诉我们,蚂蚁知道,如果这个世界没有螳螂,那么,它只有辛苦的春季、忙碌的夏季与劳累的秋天,它只有千里莽莽的冰天雪地,只有潮湿黑暗的漫漫长夜,或者生命休克的冬眠。我想,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小说,我们听不到星星的耳语,我们可能面临的是生命休克的冬眠,面临精神混沌的永夜,我们可能就永远不能对这个世界心领神会,我们的上半身,可能不会发出呼应神祇的光芒。是的,小说,也许不能使我们摆脱孤独,但至少会使我们在孤独中,看见别人的孤独,看见孤独的真谛,看见真理后面的力量。

顺便说一句,蚂蚁与螳螂,还有一个在中国更为普及的版本,是那只不过需要、饥寒交迫的螳螂,最终被冻死在路边枯叶堆中了。蚂蚁们的训子诫世代相传:淫慢不能励精,险躁不能治性。好好做好一只面地背天、脚踏实地的蚂蚁吧。

我想可能还有一个更普适的版本,那就是,全球蚂蚁都有电视和电脑了,抵抗黑暗长夜它们有了新的依靠。所以,小说螳螂还是冻死在路边枯叶堆中了。

以火热真情书写抗日战争

——读咏慷长篇小说《东江剑魂》

□胡 平

并不多见,因此也可以说体现了另一种含义的“接班”——这在文学史上都是值得研究的。反过来设想,轰轰烈烈的各种“接班”中如果不包括文化形态,岂不令人忐忑?

文学和艺术的本质包括思想,但主要还是情感。过去的红色经典作品之所以感人,首先在于其中真情实感的传达。《东江剑魂》与此前的红色经典作品在某些内质上是相通的,它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都有精神信仰,这信仰是一种灌注进去的东西。

《东江剑魂》的又一个特点是拥有大量真实可感的历史描写,小说涉及的历史包括东莞地区党组织、抗日模范壮

基础上,小说中历史画面的真实感和纵深感也来之不易。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它看做纪实意味较强的作品。当然,作者肯下这么大功夫去收集资料,一定与他对革命先驱的事业怀有真挚感情有关。

小说《东江剑魂》大跨度地描绘了陈奋强等人的成长史,这成长史同时折射了革命史、甚至是革命的编年史。同时,小说的地域场景还在不断变化,此种架构的创作是少见的,这也是《东江剑魂》的一个特点。

当然,作品在艺术上也存在一些缺憾。作者对主人公陈奋强很有感情,对他的形象几乎完全是正面描写,这样做不免使其形象单薄了一些。由于内容过于庞大,作者的主要着力点在于对主人公的刻画,来不及细写林荔根、梁焦林、莫逸萍等人的经历,影响了群像的塑造。受篇幅限制,作者忙于叙事,较少插进心理描写,也是一种遗憾。

的味道。

此外,《穆旦评传》给我感受最深的还有作者“史家笔法”背后的严谨。没有文学加工,缺少好看的亮点,很多人可能觉得这种“老实”的评传写作不生动,不太会受读者青睐。但史家提倡的就是真实,评传中的“传”要求必须有事实根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正是评传之理性的见证,其价值更多在于对研究对象的客观评价。所以,作者紧扣传主的人生,不能随意虚构,既要切人传主人生的光荣与梦想,又要紧贴传主作品的创造性美学,这样才能形成更为有效的评与传的对话格局。

《穆旦评传》更多的是作者与传主的对话,理解他的人生,解析他的作品,让这些沉潜的力量在探索中浮出水面。阅读这样的评传,你能够由此反思一个诗人不公遭遇背后的政治和人性,能从中参透那个特殊时代的历史真相。易彬从穆旦的自述和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入手,对历史考证、勾勒与还原,这种严谨的写作方法和富有文体意识的创造,才是《穆旦评传》的精彩和亮色所在。

■新作快评 孙频中篇小说《假面》,《上海文学》2014年第2期

扭曲的人格面具

□赵振杰

孙频的中篇小说《假面》延续了《长安醉》《凌波渡》《三人成宴》等早期作品中一贯的内向型写作风格和对“开放性”主题的深入开掘与勘探,色调阴郁、节奏低沉,犹如开放在荒原上的罂粟花,魅惑、妖冶、缠绵而又邪恶,充满了川端康成般的颓废颓唐之美。她的小说十分注重对人物心理活动和精神世界的揣摩与呈现,作者采用细腻传神的笔触将男女主人公作为“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内心分裂与挣扎、绝望与孤独和盘托出。

李正仪出身贫寒,相貌普通,大三已快混完了却还没有女朋友。一次次的被女生当众拒绝使这个自闭内向的大学生愈发敏感脆弱。青春期的性躁动与屡战屡败的失恋阴影长期折磨着他,生活的困顿和对前途的茫然更是让他时常感觉自己“像一只从宇宙间蹦出来的石猴子,没有来处,也没有去住,没有一个地方会真正收留他”。就在李正仪承受着来自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煎熬之时,学校附近卖包子的姑娘王姝走进了他的世界。同样来自农村的王姝,天生丽质且身材姣好,但却有过被有钱男人包养的经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态使得他们惺惺相惜,孤独成为他们彼此吸引的磁场,沉默成为他们相互“交流”的媒介。李正仪从王姝这里得到了宣泄性欲的出口,而王姝也从李正仪那里借取温暖与慰藉,二人就像两只受伤的小动物,在黑暗中为对方舔舐着伤口。然而,短暂的释放并不能换来持久的快乐。王姝的主动投怀送抱令李正仪不自觉地联想到她耻辱的过去,“得意与阴郁像两条蛇一样同时啃噬着他,使他简直感到窒息”;而李正仪由强烈的自卑衍生出的极端自负和自私也同样使王姝无法忍受。

来自于社会的、阶级的、精神的以及他者的强大压力,迫使他们戴上一副扭曲的人格面具,白天,李正仪要像个苦行僧一样承受权力机器的压迫,王姝则过着因徒般的生活;晚上,他们只有在有一出变态的性虐游戏中才能得到生理上的快感。他们仿佛两头被爱神判处死刑的囚兽,在充满仇恨与苦闷的牢笼中既相互慰藉又相互撕咬。文中多次提到李正仪“隐隐嗅到一种血腥味”,而这种“血腥味”具有双重象征意义:一是李正仪与王姝互相摧残所造成的身心创痛;二是隐喻着他们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命运。

李正仪畸形的“施虐/受虐情结”意味着他对自己以及自身之外的世界充满了敌视、厌倦和绝望。就连与王姝做爱,他都认为是一种“强奸”,因为“从小到大,被强奸的感觉他太熟悉了,每一次受辱都像是在被强奸,被强奸好,被富人强奸,然后他又被这个女人和她背后的男人强奸”。长期的假面游戏和频繁的自我暗示最终导致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他甚至觉得自己被撕裂成两个人,一个是冷静的天使,另一个是邪恶的撒旦。为了发泄,他疯狂、无耻,为了救赎,他又自责、痛苦。分裂的人格将他推成了罪犯,也让他认识到这个时代残酷的“真相”:每个人都戴着一副扭曲的人格面具,权力在谁手里,谁就可以成为任何人,但是,这副假面背后又不知道隐藏着多少可怕的东西。

作者通过两个人物在爱情旋涡中的苦苦挣扎,探讨了爱情与欲望、孤独与依赖、原罪与救赎、存在与虚无等诸多生命命题。小说结尾处两个李正仪之间的灵魂对话不仅凸显了人性固有的贪婪与执念,而且揭示出现代人所共同面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困境。

■短 评

《东江剑魂》的作者咏慷是典型的革命后代,“红二代”里当作家的人不多,咏慷的创作因此凸显出鲜明特色。

小说《东江剑魂》体现了作者融化在血液里的革命传统精神。这种精神是真挚的,一如当年上天安门一样真挚,成为了作品的魂灵。对于红色题材的书写,咏慷绝不戏说,绝不投机,只是出于诚实的信仰,这成为他创作中最可贵的成分。作者在技法上不能说没有缺陷,但由表的情感却在作品中热烈燃烧,这正是作品能够打动人、感染人的主要原因。小说主人公陈奋强的革命精神,既是咏慷辈人的精神,也是他这一代后辈的精神。此类文本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

上世纪80年代之后,穆旦被很多文学专家称为20世纪中国“现代诗歌第一人”,有人认为言过其实,有人认为名副其实。然而,不管如何看待穆旦,他已深深地影响了同代人和后来者,这些受影响的人中,有诗人、作家和学者,更多的还是爱好文学的普通读者。一时间,研究穆旦在学界掀起了一股风潮。易彬的穆旦研究系列著作,除了此前的《穆旦与中国新诗的历史建构》《穆旦年谱》和即将出版的《穆旦诗编年汇校》外,新出的《穆旦评传》,应该是最好读的。

易彬称这是一本“令人无法轻松”的书,在我看来,这种“无法轻松”并非指文字的艰深和故事的沉重,更大程度上,这源于穆旦一生沉重的个人遭遇,它恰恰对应了20世纪中国社会曲折发展的历程。

易彬在《穆旦评传》中大致以传主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小说

□须一瓜